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12月15日)

1、美国国防大学新著：《战略评估 2020：进入大国竞争的新纪元》

12月11日，美国国防大学出版托马斯·林奇三世（Thomas F. Lynch III）的专著《战略评估2020：进入大国竞争的新纪元》。该书系统分析了大国竞争时代的特点与关键技术创新。作者认为，新时代的大国竞争包括政治和外交、意识形态、信息、军事、经济等领域，比之前任何时代都更具挑战性。印太地区和东欧是经济利益冲突的焦点，太空和网络空间是最受争议的领域。大国竞争已经从工业技术主导转变为信息技术主导，而核武器、运载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军备竞赛的风险正在上升。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降低先进制造的价格，帮助创造更小巧、智能、廉价的武器。该书认为，面对新的挑战，国家制定成功的战略必须要具备创造性的、综合性的思考。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Article/2405626/strategic-assessment-2020-into-a-new-era-of-great-power-competition/>

2、《外交事务》：美国无法独自制衡中国

12月10日,《外交事务》刊登耶鲁大学历史和全球事务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署名文章《美国无法独自制衡中国——为什么国务院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错的》。作者认为,11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有鉴于其受到意识形态和一些政治因素的限制,该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注定是失败的。当前美中竞争与美苏冷战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特朗普政府还在用冷战思维应对21世纪的问题。中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相较过去而言具备更多的务实性和耐心,其两大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主导地位。文章提出,美国的应对策略应当是利用上述两大目标之间的矛盾,寻找政策突破口。这要求美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关系。但是,对美国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做好美国国内的治理和建设。美国只有通过国内的根本改革才能与中国展开有效竞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10/us-cant-check-china-alone>

3、《外交事务》刊文分析拜登的民主峰会议计划

12月14日,《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刊登布鲁金斯高级访问学者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奥巴马时期国务院官员、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杰出教授布鲁斯·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撰写的文章《民主峰会并非良药》。文章认为,这项政策将意识形态与利益混为一谈,有可能得不偿失。拜登政府可能会发现,峰会的高要求将会带来更多问题,迫使

美国在邀请名单的复杂问题上挣扎，并使美国面临其在全球集会上领导会议的阻力。作者称，美国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存在的、较小规模的民主盟友和伙伴集团上，并振兴其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工具。同时美国也要认识到，美国在民主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国内重建规范和机构制度。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12-14/democracy-summit-not-what-doctor-ordered>

4、FT :全球投资者在华投资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

12月14日，《金融时报》发布了亚洲资本市场记者哈德逊·洛基特（Hudson Lockett）和驻上海记者托马斯·黑尔（Thomas Hale）的文章《全球在华投资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文章指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始于中国，但随着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已转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年。文章分别评价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表现。在股市方面，以美元计算，中国的沪深300指数（CSI300）今年上涨约27%，高出标准普尔500指数13个百分点。以科技股为主的深圳创业板（ChiNext）涨幅约59%，超过了失控的美国科技基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在债券方面，债券收益率稳步提升。相比其他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将债券收益率推至接近于零的做法，中国央行能够保持其基准利率几乎不受影响并确保债券收益率稳定。针对中国投资市场的优良表现，文章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政府持续推进金融体系更加开放的

改革。第二，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果断的反应和行动。文章最后引用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固定收益部门主管海登·布里斯科（Hayden Briscoe）的公开讲话：“目前世界形势下，全球流入中国的资金只会加速。”

<https://www.ft.com/content/d9ac222d-90d8-4570-b89e-a99f1bd4829b>

5、CSIS：荣耀从华为分离体现中国具备强大工具箱和能力

12月1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弗里曼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Scott Livingston）撰写的研究报告《华为、荣耀和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工具箱》。报告认为，在这场荣耀从华为分离的交易中，中国政府支持的投资者和一些私人投资者的介入挽救荣耀产品线不受美国制裁的影响，以继续获得国际供应链的支持。这一案例表明，中国国企、私企、国有金融机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共同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可以称之为“中共公司”（CCP Inc.），这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战略的最新演变。中国正有效利用政府和企业合筑的生态来应对美国的制裁，并促进自身高科技领域发展，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虽然荣耀从华为分离是一个防御性策略，但是未来中国可能通过这种控制机制来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节点（chokepoint）。拜登政府在考虑美中双边关系时，必须考虑北京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工具包。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uawei-honor-and-chinas-evolvin>

6、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出五个改进核军控的建议

12月14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其核政策项目联席主任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及研究员托马斯·麦克唐纳（Thomas MacDonald）的文章《五个近期改进核军控的建议》。鉴于中、美、俄三国间发生的常规摩擦与潜在的深度危机，文章提出了五项改进核军控的、且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实际建议。文章认为，这些建议一方面有助于解决每个国家的具体安全关切问题，避免军备竞赛与冲突升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督促三国——尤其是美、俄——履行其裁军义务，巩固核不扩散制度。第一，美俄两国应每年交换两次本国已部署的核武装潜巡导弹（nuclear-armed SLCMs）、非核武装潜巡导弹（nonnuclear SLCMs）以及非核武装潜射型助推滑翔导弹（nonnuclear SLBGMs）的数量报告；第二，美俄两国应在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基础上，同意对二到五对实际或可疑的空弹头储存设施进行相互检查，以证明它们不含核弹头；第三，美俄两国应就涉及欧洲“宙斯盾”岸上弹道导弹防御设施的一揽子措施达成一致；第四，中美两国应联合宣布停止生产可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第五，中美俄三国应同意互相通报所有太空发射系统测试、弹道导弹或助推滑翔导弹测试。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2/14/revamping-nuclear-arms-control-five-near-term-proposals-pub-83429>

7、CSIS 刊文分析美国核弹头现代化和“新”核武器

12月1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官网（CSIS）刊登其核问题项目（PONI）主任、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瑞贝卡·赫斯曼（Rebecca K.C. Hersman）和核问题项目研究助理布萊斯·法拉鲍夫（Bryce Farabaugh）撰写的简报《美国核弹头现代化与“新”核武器》。这份简报审视了围绕美国核弹头能力发展的辩论，以及美国是否正在制造“新”核武器。简报认为，美国和英国核弹头现代化计划具有必要性，但也带来巨大的财政和地缘政治挑战，包括：维持政治支持、在漫长采购期限内保证资金支持、与对手的核现代化计划竞争以及充分应对防扩散挑战。因此，英美两国的核计划应紧密结合，特别是在SSBN（Boeing Broadband Satcom Network，宽带卫星通信网络）导弹和弹头系统的现代化方面，要求有关计划的政策声明步调更加一致，并对双方现代化时间框架更加了解。此外，简报认为，为应对障碍，核部门应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普及关于核弹头现代化的专门知识，并构建对核弹头现代化优势及风险的共同理解。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nuclear-warhead-modernization-and-new-nuclear-weapons>

8、《经济学人》：巴黎协定5周年取得新进展，但远远不足

12月13日，《经济学人》气候变化中心发布文章《巴黎气候承诺周年取得了进展，但远远不足》。文章介绍了12月12日由联合国举办的气候雄心峰会。本次峰会旨在纪念《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落实气候行

动，并推进国际多边进程。文章列举了成员国为实现《巴黎协定》所付出的努力，其中，文章重点关注了三类地区。第一是以巴巴多斯和马尔代夫为代表的低排放国家，这些国家大多表示将在未来十年内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第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高排放发展中国家，通过协定的助推，这些国家将有望提前到达排放峰值。第三是中等排放发达国家，以欧盟为例，欧盟已达成协议，在未来十年内，减排目标将从 40% 增加到 55%。气候雄心峰会在充分肯定成员国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当前气候问题依然严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呼吁各国政府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联合国气候谈判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在讲话中称“尽管雄心壮志令人鼓舞，但这还远远不够”。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0/12/13/paris-anniversary-climate-pledges-bring-progress-but-fall-short>

9、CFR 刊文分析拜登设立气候特使的深层含义

12月5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刊登其能源和环境高级研究员爱丽丝·希尔（Alice C. Hill）撰写的文章《拜登的气候变化政策：为何他的特使角色十分重要》。文章认为，拜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设立气候特使职位，向世界发出了三个强有力的信号：一是，美国将重新参与国际行动；二是，美国重新担负起全球气候领导的重任，同时也巩固美国对气候外交的承诺；三是，美国政府将不仅把气候变化作为环境挑战，而且将其作为对国家安全的日益严重

的威胁。气候特使会在总统关于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决定中拥有发言权，因为此次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任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将有很高自由度来定义这一角色。此外，他将指导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承担恢复美国国际信誉的艰巨任务。

<https://www.cfr.org/in-brief/biden-climate-change-policy-why-climate-envoy-matters>

1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欧盟新的全球人权问题制裁机制

12月14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其高级研究员理查德·扬斯（Richard Youngs）的文章《欧盟新的全球人权问题制裁机制：是突破还是干扰？》。12月7日，欧盟同意建立全球人权问题制裁机制，这一制度的新颖之处在于使欧盟更容易对侵犯人权的个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这无疑是人权保护的一大进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引发对欧盟民主议程的新担忧。文章提出如下两大问题：其一，尽管将重点置于个人之上的新制裁机制将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但国家层面上的制裁必要也将遭到弱化，导致人权政策与其他外交政策间的脱节，不利于更广泛的民主议程的推进；其二，全球人权问题制裁机制如何与欧盟其他制裁框架相关联很可能成为影响欧盟对外行动的主要问题，如若关联不佳，将导致制度间的互相拖累。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0/12/14/new-eu-global-human-rights-sanctions-regime-breakthrough-or-distraction-pub-83415>

撰稿人：党 森、王宇彤、蔡依航、胡文宸
审稿人：朱荣生、许馨匀